

目 录

红军足迹留在布依族山寨·····	卢衍收集整理 (1)
回顾册亨教育三十年·····	王安明 (7)
者茂农中办学纪要·····	丁鹤鸣 (21)
册亨清代义学和私塾初探·····	袁仁华李鸿业 (31)
册亨县民国时期教育梗概·····	王安明收集 (35)
册亨开办桑蚕学校的经过·····	袁仁华李鸿业 (45)
追忆我的教书生涯·····	李鸿业 (49)
册亨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三十年 的回忆·····	韦临高 (60)
册亨林业的变迁·····	宋乃贤 (81)
册亨气象站概况·····	龚乃荣 (92)
前进中的册亨商业·····	沈汝林 (101)
册亨酒厂史略·····	卢 衍 (107)
册亨琐记·····	李兆杰 (115)
册亨奶人始末·····	袁仁华 (122)
乃言天主教堂概况·····	黄福建 (126)
册亨马简介·····	卢衍袁仁华 (130)

红军足迹留在布依族山寨

卢 衍 收集整理

一九三五年四月，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一军团，从现在的望谟渡过北盘江进入贞丰县境。其中，有千余人从贞丰县尼罗、石柱进入册亨县的洛凡，经观音岩、遮年海、纳梭、邱家营、蒋家坝到洒寨、坛坪。红军到洒寨、坛坪时，太阳已经偏西，就决定在这里住宿。次日晨，红军整装继续前进，经纳武、纳新出册亨县境，进入安龙县的定头、乐溪，向安龙县城进军。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日，笔者到坛坪采访，得到七十八岁寨老韦乾恒和六十九岁老人韦开国的热情帮助，口述红军过洒寨，坛坪的事迹，兹记录如下。

牛年（1935年）四月二十八那天，我们村里人有的上山种包谷、打秧青，有的在田里收豌豆、油菜，有的犁田、撒秧，正是春耕

大忙季节。傍晚，忽听远处山上传来，“大兵来罗！人多呀！”喊声震荡山谷，听着的人也跟着喊，“大兵来罗！”声音传遍四方。顷刻间，山上、田坝、寨子的人都知道“大兵来罗！”可是谁也不知道来的是什么兵？是好是坏谁也不清楚，于是就惶恐起来。还是吃苦头多的老年人提出：来了那么多兵，兵多不由将呀！一骚扰起来就吃不消了，还是上山避一避为好。大家觉得老年人见多识广，经验丰富，于是就各自赶快回家收拾能带走的东西，扶老携幼上山。实在难走动的贫苦老年人，只好留下看家。

当红军快进村时，还有人在跑。红军战士见老乡惊怕，就喊话：“老乡！别怕，我们是工农红军……”红军的口音别，群众听不懂，不知喊些什么，越喊群众越害怕。特别是口音别，便引起群众误认为是“游勇”那类匪兵，因而回想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广匪洪大王饶五率领几千人扰乱我县沿南盘江一带，前队进兵到者术，震惊全县。人们称他们叫“游勇”，他们讲话别声别气的。那些野兽般的匪兵狠毒极了，每进一个寨子，见财物就

掳掠，见妇女就奸淫，杀猪打狗，鸡鸭捉光。不少村寨，户户被劫，家家遭殃。从那以后，只要一提大兵，就谈虎色变，惊恐异常。

红军一进入布依族村寨坛坪，讲话面带笑容，态度和蔼可亲，不乱进哪家，即是未关门的人家，也只进堂屋、火房，不乱进人家内房。在寨子里，只要一见人，红军就亲热地打招呼，宣传红军政策。有的红军安排食宿，有的到寨边树林拣干树枝煮饭，有的安锅烧水。天快黑了，村里主要的成年人都躲避了，在家的又是些老弱妇孺，语言不通，找谁商量？向哪家买吃的？很为难。明天要照常赶路，只好打富户的主意了。经过了解，认为韦英才家是大富户（笔者：韦英才系清代秀才，其弟韦英政当过区长），就在他家粮仓撮了八石多谷子（二千四百多斤），用自带的打米机加工，一会就把大米分给部属下锅，留部分做第二天早饭。菜蔬、油盐等，使用谁家的多少，就将钱放在原物处。为了照顾病员，要哪家的蛋，也把钱放在蛋窝里。红军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被留下看家的老年人亲眼看到，于是放心了，有的

到寨边用布依话喊自家人，“山上的，回家来呀，不要怕，这些兵不像“游勇”那样，他们不乱拿东西……”躲在寨后树林里的人听得清清楚楚，有的贫苦人顾虑少些，先回家来。一进寨，红军面带笑容，先打招呼，热情攀谈，果然不同“游勇”。有的乡亲还及时回山去接妇女小孩，同时把东西拿回家。除了那些大富户还怕外，几乎全寨都回家了。

第二天早餐后，红军把住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归还一件件借用之物，才整队出发。快出村时，红军战士还边走边回头向村里老乡点头招手致意告别，老远还喊“老乡，麻烦了，再见！”

韦乾恒老人还想起一件事，他深受感动地说：“红军走后一段时间，才听到蒋家坝的人讲——红军过他们那里，见到一些面黄饥瘦的干人，红军就问蒋家坝夏铁匠，“是什么原因？”夏铁匠说：“他们穷得没有粮食吃，只吃些糠菜，还要做活路，怎么不黄瘦。”红军了解到当地百姓的苦处后，为了使贫穷人恢复体力，好进行春耕生产，就把一匹跟不上队的

骡子交给夏铁匠，并嘱咐他，把骡子杀了分给穷人们吃。以后赶场我碰着夏铁匠，提起这件事。他说，这件事确实有，我把骡子杀了分给乡亲们，他还解释，红军就是朱毛的队伍，是维护穷人利益的。的确，红军给饥饿的人送食肉，胜过雪里送炭，体现了人民军队爱人民，怎能不使乡亲们久久地怀念红军。

红军路过册亨县境，多是经过布依族村寨，虽语言不通，服饰各异，但不受任何干扰损害。因此，红军战士觉得这一带人民纯朴勤劳，深受压迫，故把病重跟不上队伍的许先彪同志，留在坛坪大队海田寨王守先老贫农家养病。许在王家，得到全家人的殷勤护理，不久把病养好，许与王家共同背星戴月地劳动生产，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亲如兄弟，在艰难的岁月里，同甘共苦。不幸的是，一九四一年先彪同志得了重病，在无医少药的边远乡村，王家请土医尽力医治，但医治无效，于九月一日与世长辞了。王守先家及乡亲们为纪念这位远方来的阶级兄弟，按民族习俗安葬，还在墓前立了一块碑，以表示布依人对红军战士的永远怀

念！解放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二日，册亨县民政局才把许先彪同志的忠骨迁到县城东郊烈士陵园重葬，並立碑注明许先彪烈士系江西省西公府大桥头人。许先彪同志在海田的六个春秋，他与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利用一些适当的机会——赶场同路、喜庆节日等，宣传红军的政策，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许先彪同志在海田时，有些与他交往密切的人，还见过他的党证，一本有五角星的笔记本，一个印有五角星的挎包，可惜这些革命遗物，一九四九年王守先家遭受火灾时被烧毁了。至今，在海田及附近村寨，只要一提到老红军许先彪同志，他的音容笑貌还深刻印在那些同世人的脑际，可见红军对这一带布依人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啊！

回顾册亨教育三十年

王 安 明

我于五十年代分至册亨从事教育工作，迄今近三十年。先后在县、区、社和生产大队任教，并且多数时间都肩负学校行政事务。又因工作需要，足迹踏至全县大部分学校。其间曾调其它部门工作，但为时甚短。所以，册亨解放后教育事业的恢复、发展、调整、危机和振兴，几乎我都经历。现将册亨教育之梗概用拙笔录后，请知情者给予斧正，以正史实。

一、恢 复（1951——1955）

民国三十八年（1949）十月，册亨国民党政权临终前夕，册亨县政府通令停办全县学校，将教育经费挪去建设册亨预备兵团之用。一九五〇年土匪叛乱时，不但学校全部停办，而且各校财产损失殆尽。一九五一年五月解放后，

册亨县委在建设人民政权的同时，着手恢复教育。在五一年秋，恢复了册阳、秧坝、坡姝、者王、威牛等小学，共有学生350人，教师18人。当时经费困难，学校破烂，教师缺乏。各级人民政府和工作干部，紧密依靠群众修复学校，或借用民房，聘请当地教师，因陋就简开学上课。那时教育科仅刘传儒同志一人，他经常深入各校帮助解决困难。一九五二年又恢复了弼佑、乃言、者楼、冗贝、冗渡、庆坪、大路等小学，在校学生增加到一千多人。

为了解决师资困难，一九五二年春，册亨县委在各区、乡（镇）挑选了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年送兴义专区少数民族师训班学习，经短期培训后仍回册亨工作。五二年夏，省、地又分来一批少数民族师训班学员到册亨任教，同时又到安龙聘请部分教师。因此，五二年底全县有教师39人。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一九五二至五三年，先后在秧坝、丁里办起了民族小学，对少数民族学生实行免费教育，由学校发给书籍文具和人民助学金。全

县各族子女纷纷奔赴秧坝、丁里民族小学学习。同时还有安龙、望谟和广西的田林、乐业等县壮族学生也来就读。从而掀起了入学高潮，学额猛增。秧坝民小在五三年就有学生600多人，教职工15人。丁里民小有学生300多人，教职工10人。

册亨人民翻身当家作主后迫切需要学习文化，特别是农村干部，他们祖祖辈辈受尽了没有文化的痛苦，不能让下一代再成为文盲。因此，他们办学积极性很高，主动协助政府创造办学条件，动员和带领群众投工献料建修学校。至一九五五年，国民党统治时期办有学校的地方已基本恢复，并新建了一些学校。这时，全县已有小学32所，在校学生2364人，教职工63人。

二、发 展（1956——1960）

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我县有的农业社找不到会计，曾到外社或安龙县去聘请。在未请到会计前，就用竹筒装包谷籽记工分。各级干部和广大翻身农民深感没有文化的困难。在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鼓舞下，我县掀起了解放后第一次办学高潮。一九五六年于县城创办册亨中学，招生35名，教师2人，结束了我县学生上中学要到外县的历史。一九五七年全县42个乡都办起了公办小学。

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我县贯彻了“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群众办学积极性高涨，民办小学、幼儿班、托儿所、农民夜校、农业中学等如雨后春笋。全县有公办小学42所，民办小学26所。大多数村寨或生产队都办起了幼儿班、托儿所和农民夜校。在校小学生4783人，其中民办学生1478人。小学教师187人，其中民办教师33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40.3%。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册亨和安龙并县。各公社或管理区创办农业中学，采取半耕半读的形式，招收农村知识青年和社队干部，主要学习文化和农业生产基础知识，同时还劳动生产改善办学条件。一九五九年，原册亨县属区划共办了十所农业中学，招生460人，有的设

在公办中心小学，有的搭茅棚，勤俭办学，艰苦奋斗，为社队培养了一批骨干。可惜在一九六〇年或六一年困难时期，所有农中都先后停办。

一九五九年，册亨中学学额猛增，有12个班，学生600多人，教职工30多人。由于教育事业发展过猛，使得学校教师、校舍、桌凳都非常紧张。在教学方面，对课程大砍大合，师生又参加“大炼钢铁”，“大搞深耕”，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过多，打乱了教学秩序，使教学质量有所下降。

在册亨教育发展阶段中，值得敬佩的是当时教育科长马明同志。他工作深入细致，生活俭朴，经常到各校了解情况，关心教师疾苦，帮助解决具体困难。他对全县学校情况和教师思想如实地掌握，所以能正确地指导全县教育工作。虽然册亨气候炎热，生活艰苦，但大多数教师都能安心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这与他领导有方分不开的。五十年代的教师都很留恋他。

在一九六〇年困难时期，有部分教师经不

起困难的考验，自动离职回家。以后虽经三番五次请回了一部分，但全县仍有20多人未回。由于生活困难，学生流动大，很多学校都停办了。全县小学只剩下27所，其中民办小学仅有两所。这是我县解放后教育事业第一次受到的挫折。

三、调 整（1961——1965）

一九六一年，在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指导下，我县教育事业在县委的领导下进行了调整。对发展不适当、布局不合理的一些小学进行了合并，集中力量办好公社中心完小。为了支援农业第一线，册亨中学压缩了规模，下放农村超龄学生400多人。对五八年以来吸收的代课教师和五八年以后办的师训班出来的教师全部下放。保留下来的教师大多数是五八年以前参加工作，并且多数是师范毕业或受过业务训练的，所以教师素质较好，为调整后提高教学质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九六一年八月恢复册亨原县建制，县城迁回者楼。

一九六二年农业政策稍微放宽，农村形势

有了好转，困难时期已基本渡过。一九六三年，全县中、小学都试行了中央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整顿了教学秩序，建立规章制度，执行升留级规定，贯彻以教学为中心、教师为主导等教学原则，使我县教育工作有了好转。

为了检验教学质量，每学期主要学科由县或专区命题统考，排列名次，用升学率和及格率作为衡量学校工作好坏标准之一。当时的册阳、者楼、高洛、丁里、弼佑、秧坝、乃言、丫他、冗渡、冗贝、威旁、坡坪、大路、庆坡、者王等中心完小，都是办得比较好的学校。册亨中学在安顺专区中学统考中，某些学科曾名列前茅。

那时，教研活动比较活跃。县教研室经常到各校总结教学经验，解答教学疑难，刻印《册亨教育简讯》，刊载教学经验，表彰好人好事。各辅导区公、民办教师坚持每两周活动一次，探讨教学业务，观摩公开教学。各校教师坚持政治、业务学习，每周三次以上。有的学

校还组织教师文化进修。教职工的学习和工作积极性都比较高。大多数教师都认真备课，编写教案。学校每周或间周检查教师备课一次，并签名盖章，以示检查。大多数教师上课认真，不允许随便离开教室，更不能边带小孩边上课。批改作业也比较细致，学校经常检查教师布置作业分量、批改次数和质量。教师经常进行家访，主动配合家长教育学生。多数教师时时以身作则，处处注意为人师表，因而普遍受到社会和家长的尊重。学生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尊重师长；教师亦爱护学生蔚然成风。

每一学期结束，教师都要写学期工作总结，集体鉴定，报教育局存档。学校每学期都要写工作总结，全体教职工开会通过，报教育局备查。通过学期总结，肯定成绩，找出差距，提出今后改进意见，并评选出先进教职工，报上级表彰，教育局每年召开评功表模大会一次。这些都已成为制度，很多学校习以为常，自觉做好这些平凡琐碎而又艰苦细致的工作。所以从六三年至六五年，全县教育质量都有了提

高，受到各级领导和群众的好评。

一九六五年，全县有中学 1 所，小学 9 1 所，其中民办小学 4 6 所。在校学生：中学 2 7 0 人，小学 8 7 3 1 人，其中民办小学 3 0 1 3 人。中学教师 2 6 人，小学教师 2 2 1 人，其中民办教师 59 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54 %。

四、危 机（1966——1976）

正当我县教育事业欣欣向荣，教学质量蒸蒸日上之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教育战线首当其冲，党的领导取消了，学校行政瘫痪了，多少“园丁”苦心经营的教育成果被冲毁了。各校校长成了“走资派”或“修正主义分子”。册亨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黄楷同志和县教育局副局长王惠斌同志，先后在一九六七年九、十月间，含冤自尽。多数学校被宣布成培养修正主义的“苗圃”、产生修正主义的“瘟床”。教师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或历史稍有问题的教师，随意揪斗。

学校停课闹革命时，教学设备遭到破坏，

财产被人盗走，实在令人痛心。很多教师目睹青少年误入歧途，遭受精神污染，内心非常痛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毁于一旦”，谁不伤心！以后虽然“复课闹革命”，但学校整天搞“斗、批、改”，抛弃文化课，批判“三中心”（教师、教材、课堂），取消毕业、升学考试和升留级制度，大砍基础知识课，强调“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和“革命大批判”，反对学习文化基础知识，搞所谓“开门办学”。眼看很多青少年成为文盲，有的甚至成为流氓。十年动乱，使很多青少年丧失了学习的大好时光，浪费了宝贵年华，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同时，还提出“读大学不出县，读高中不出区，读初中不出公社，读高小不出大队，读初小不出生产队”等一套“左”的口号。因而一九七五年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第二次办学高潮。中学由1所增至44所，小学增加到555所。在校学生27476人，其中：中学生3528人，小学生23948人，其中民办小学生13094人。教师1935人，其中：中学教师450人，小学教师1485人，